

# 中国出口规模的周期更迭及趋势分析

## ——基于重大事件的视角

刘 江 李义福

**摘要：**近20多年以来，我国的出口运行呈现出波动式的上升特征，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波动程度。看似复杂的波动性背后是否隐藏着内在的规律性特征？本文根据1997年至2021年间的月度出口数据，基于重大事件和国内宏观经济转型的维度，发现我国出口经历了三个非对称的周期过程，目前正进入第四个阶段。研究显示，过去的三个周期顺次表现出周期变短、增速放缓、波动加大的趋势。文章进一步对已经开启的第四个周期的运行特点作了预测。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新一轮周期开启之后，市场化改革应加速向纵深推进，并将出口导向全方位从规模扩张和增速提升转向改善出口结构和平稳运行方面，为此需排除阻碍创新的制度性障碍，并完善与相关国家的沟通机制。

**关键词：**出口周期；尤格拉周期；出口波谷；振动幅度；振动强度

[中图分类号] F74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2021)08-0119-18

### 引 言

我国出口数据显示，1997年7月—2021年3月间我国的出口月度平均环比增速达2.04%，相当于以每月递增7.92亿美元的规模连续增长285个月。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的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的出口以13.75%的份额首次跃居全球之首。2018年我国出口份额达12.77%，仍分别高出第二位美国、第三位德国和第四位日本4.22、4.76和8.98个百分点。然而，我国出口的这种“双高”（高增速和高份额）特征也招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压力（谢建国等，2017<sup>[1]</sup>；张先锋等，2018<sup>[2]</sup>；杨飞等，2018<sup>[3]</sup>；余振等，2018<sup>[4]</sup>），甚至在2018年成为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最大目标。<sup>①</sup>随着2019年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继而引发的经济萎缩，导致全球出口骤然低迷。显然，

[收稿日期] 2021-02-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物流瓶颈及解决方案研究”（17BGL011）

[作者信息] 刘江：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liujiang\_2015@126.com；李义福：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

<sup>①</sup>商务部：2018年中国面临贸易摩擦总体形势或依然严峻 2018年01月26日09:32 人民网 [EB/OL] <http://ydy1.people.com.cn/n1/2018/0126/c411837-29789106.html>

如果疫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再考虑到其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世界经济的恢复将面临重大压力,如政府债务率继续攀升、国际收支加速失衡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出口亦将面临更大挑战。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我国政府及时制定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确定了向国内大循环方向推进的工作重点,同时强调参与国际循环的重大意义。显然,因出口在既在国际循环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对内循环的顺畅运行具有特殊的内在支持效应,故探讨我国出口的动态运行趋势自然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出口问题的研究文献较多,归纳起来多是从出口产品结构的演变视角展开,属于长周期的观察,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文献对于我国出口的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有文献从我国出口纵向变迁的视角发现,出口商品的结构处于持续升级之中(江小涓,2007<sup>[5]</sup>),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不断提升(杨汝岱和朱诗娥,2008<sup>[6]</sup>)。第二类文献基于横向视角认为我国仍非贸易强国(裴长洪,2009<sup>[7]</sup>),尽管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转移,且高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但与预期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张桂梅,2008<sup>[8]</sup>)。我国出口的优势地位仍旧依赖要素成本的低廉(刘建丽,2009<sup>[9]</sup>;傅朝阳和陈煜,2006<sup>[10]</sup>;林毅夫等,2003<sup>[11]</sup>;孙杰,1997<sup>[12]</sup>;潘镇,2006<sup>[13]</sup>),并且这种优势在短期之内尚难受到挑战(刘国晖和张如庆,2014<sup>[14]</sup>;郑有国和刘佑军,2007<sup>[15]</sup>;魏锋和沈坤荣,2009<sup>[16]</sup>)。这样就可以解释我国贸易量的增长为何主要来源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非一体化(吴福象和刘志彪<sup>[17]</sup>)。尽管有证据表明那些不在此环节的出口企业跨越了“低加成率陷阱”(诸竹君和黄先海,2020<sup>[18]</sup>),但总体上该优势也令我国的出口贸易难以突破“天花板”效应。随着国内经济转入“新常态”,曾经促使我国出口规模快速攀升的优势在弱化,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逐渐上升的趋势不可逆转。同时国内长期形成的落后产业结构(陈志友,1992<sup>[19]</sup>;莫兰琼,2016<sup>[20]</sup>)与相对低端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互牵制,优化出口结构的难度逐步加大。来自微观层面的证据也印证了该判断(许昌平,2013<sup>[21]</sup>;陈勇兵等,2012<sup>[22]</sup>)。若考虑到影响出口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和革命事件、自然灾害及恐怖袭击等(鲁晓东,2017<sup>[23]</sup>),我国出口面临的压力不容乐观。2019年末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再次为不确定性作了背书。综上,无论对我国的出口持乐观或是相反的态度,均是基于长期演变的维度。

第三类文献基于出口周期运行的角度,仍属于基于长期视角。如有文献基于外部需求的周期变动考察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唐宜红和林发勤,2009<sup>[24]</sup>),有文献考察出口与开放度、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陈刚等,2008<sup>[25]</sup>;Baxter,1995<sup>[26]</sup>),有文献探讨出口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内在联系(李旻等,2013<sup>[27]</sup>;郑宝银和林发勤,2009<sup>[28]</sup>;车维汉和贾利军,2008<sup>[29]</sup>;Boivin and Giannoni,2007<sup>[30]</sup>;

杜婷, 2006<sup>[31]</sup>; 宋玉华和高莉, 2007<sup>[32]</sup>; 郎丽华和张连城, 2011<sup>[33]</sup>), 还有文献研究出口周期变动的技术方法(赵琳等, 2011<sup>[34]</sup>)。显然, 以上诸多文献在着眼于长期考察视角的同时, 忽视了对出口中期和短期运行特征的分析。而那些影响我国出口的诸多紧迫而重要的挑战, 不但对影响其长期轨迹, 也会对中期和中短期运行产生显著影响。当前, 在世界经济总量和出口总量均达到历史性高位的背景下, 不确定性也在成倍增加, 我国出口面临的来自中期和中短期在挑战也随之放大。现有文献恰在揭示出口运行的中期和中短期特征方面有所不足。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根据1997年6月—2021年3月间的月度出口数据, 从三次世界性重大事件和国内经济运行的重要转轨的视角, 来考察我国出口的中期和中短期运行特征, 并据此预判出口在下一个中周期的主要运行特点和趋势。

## 二、初步考察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 分别来自世界银行网站、世贸组织网站、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国内权威官方媒体。其中, 我国历年出口月度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统计局并未单独公布关于2020年1、2月份的出口数据, 只给出相应月份的同比增速和3月份的累计出口值。据此, 我们可以根据2019年对应月份的出口数据, 推算出2020年1、2月份的出口额分别是2113亿美元和1119亿美元。然而, 按照海关总署2020年2月份公布的1月份出口1.5万亿元人民币的信息,<sup>①</sup>结合统计局提供的2月份“出口总值累计值”数据, 及国家外汇总局公布的2月份平均汇率, 可推算出1、2月的出口额分别是2316亿美元和609亿美元。显然, 按两种途径得到的结果有差异。其中, 1月份出口额相差约200亿美元, 相对差距10%; 2月份出口额相差约510亿美元, 相对差距46%。下文分别称之为统计局数据和海关数据。对比分别采用两套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 该差异除影响相应月份的环比增速、同比增速及平均规模之外, 并不对出口的中期趋势分析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故下文的实证分析主要依据统计局数据, 将海关数据作为补充。

### (一) 短期运行特征

图1展示了我国历年的平均月度出口数据, 可以发现出口运行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即每年的11月和12月是出口高峰月, 分别到达1245亿美元和1310亿美元, 2月份则是出口低谷期, 平均仅861亿美元,<sup>②</sup>所以本文将2月份出口异常低的现象称之为出口的“春节效应”, 属于短期运行特征。如以月度平均规模和2月份规模的差异考察春节效应的大小, 发现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2020年2月是二十多年来春节效应最为突出的月份, 高达1071亿美元。然而, 到2021年2月份回落至318亿美元。该情况既说明新冠疫情对我国短期出口构成的冲击异常严重, 同时凸显我国出口在遭遇意外冲击时所具备的强大恢复能力。

①[EB/OL] <https://v.qq.com/x/page/a3050ikkst8.html>

②按照海关数据是839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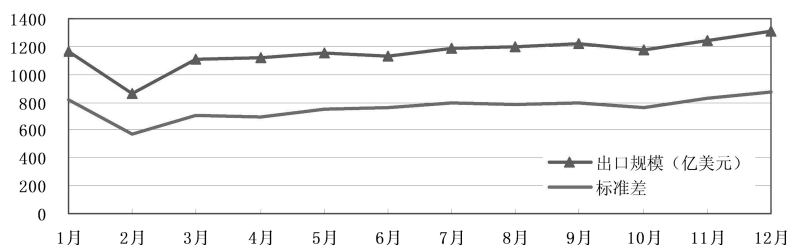


图1 1997年6月~2021年3月月均出口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下同）

(二) 中期和长期特征

若将出口月度数据置于24年的时间轴考察，显然可以发现出口基本上处于长周期中的上升阶段。同时也可以发现即使是在上升期，大致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次剧烈的波动，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根据可以初步反应剔除季节影响后的同比增速指标来看，出口出现过四个明显的下降期，分别是1999年上半年、2009年上半年、2016年初和2020年初。其中，2009年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在此之前，出口同比增速以正增长为主，但之后是同比增速正负增长的情况交替出现。可以据此初步将出口运行划分为四个中周期，相应的分界点大致在1999年、2009年、2016年和2020年，分别对应着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的重大转型和新冠疫情的发生期。

为更严谨地划分周期阶段，还需要将出口数据中的短期季节性信息、其他无规律的“干扰”信息剔除。本文使用EViews9.0软件提供的X-12季节调整方法中的加法模型，在剔除掉上述干扰因素后，得到了只含中周期变动信息的数据，即本文界定的“出口趋势”数据（图2）。下文对出口运行特征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刻画，如未作特别说明均采用该数据。

出口趋势的运行轨迹显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出口基本呈持续上升状态，波动仅限于小幅振荡范围。然而自此次危机之后，出口运行的波动性显著加强，其中有三个波动过程非常明显。为更详细刻画出口的波动特征和周期运行特征，分别引入波谷、绝对振动幅度（以下简称振幅）、相对振幅和振动强度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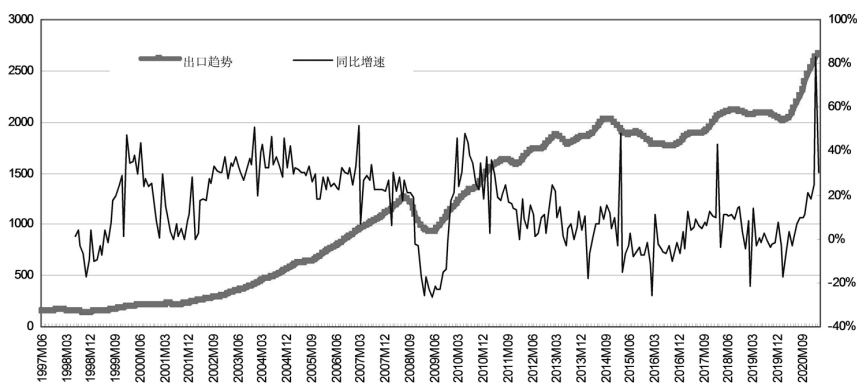


图2 出口趋势和同比增速

本文对波谷的界定是，出口趋势环比增速出现连续下降7个月以上并重新回升至下降之前水平的过程。将波谷跨越的时间长度称之为一个波谷期，相应将处于波谷期的最低出口规模称为谷底。

据此标准，第一个谷底出现在1998年10月份，对应的时间段是亚洲金融危机期。但是就绝对规模而言该谷底在总长286个月的趋势线中并不突出，主要原因是近20年来，我国的出口规模增加了15倍之多。所以即使是20年前出口规模的大幅波动，相对于20年之后出口规模的小幅波动，自然就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就亚洲金融危机事件本身对当时出口的影响而言，却不宜被轻易忽视。第二个谷底出现在2009年5月份，与之对应的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损失了危机开始时出口规模的26.13%，按照原始出口规模计算损失则达52.52%。而且此轮危机的波谷期比第一次危机的波谷期多出3个月。第三个谷底出现于2016年9月份。恰恰是在2015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速从之前的10%以上下降到7%以下，同时反映景气指数的资本市场也开始了延续四年的低迷，加之全球需求下滑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出口进入了漫长的波谷运行阶段。此次下降最严重的情况出现在2016年9月份，该月出口规模仅1765亿美元，相当于2012年10月份和11月份的水平。最近的一个谷底出现在2020年2月份，对应期间发生的事件是新冠疫情。

为更全面刻画出口的波动状况，再引入振幅、相对振幅和振幅强度的概念。振幅被界定为波谷期间最高规模与最低规模之差，以反映出口绝对规模的变动幅度。考虑到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显著，故该指标不适于比较不同时期的出口波动程度。为使不同时期的出口波动有可比性，引入相对振幅，用振幅与对应波谷期间的平均规模之比表示。再由于出口的波动剧烈程度还与波谷经历的时间长短有关，引入用相对振幅与对应的波谷期相比表示的波动强度，旨在说明单位时间内波动的相对程度。那么，在相对波动程度相同的条件下，持续的时间越短出口受到的冲击程度越大。

表1是对四个波谷期主要特征的汇总。按出口趋势数据，第2个波谷期无论是相对振幅还是波动强度均为历年之最（按原始数据计算第4个波谷期最为严重）。最后一行的波谷期与周期比衡量的是波谷期与下一周期的周期长度的相对长度，旨在从时间的角度考察重大事件的延时冲击效应。结果发现第3个波谷最高。说明尽管波谷期间相对振幅并不剧烈，但由于持续时间长，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还可以注意到，如按出口趋势来计算，第1个波谷期间的相对振幅和波动强度仅次于第2个波谷，意味着第一个波谷期间所揭示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探讨。

根据上文确定的波谷低点可相应划分出4个中周期。即将第1个谷底到第2个谷底的阶段划分为第一个中周期，以此类推依次划分出余下来的4个中周期（表2）。数据显示，4个中周期的周期长度依次下降40个月左右。由于每一轮运行的周期长度大致在4—10年左右，故称之为中周期。因为各周期的长度不同，体现出了非对称的周期运行特征。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出口运行的各中周期内部，同样存在中短周期的波动性。



表1 四个波谷的统计特征

单位：亿美元

使用数据	趋势				原始				原始 (海关)
	1	2	3	4	1	2	3	4	4
波谷序号	1	2	3	4	1	2	3	4	4
波谷期间	1998.1— 1999.7	2008.8— 2010.4	2014.11— 2018.1	2019.8— 2020.5	1998.1— 1999.7	2008.8— 2010.4	2014.10— 2018.1	2019.8— 2020.5	2019.8— 2020.5
波谷时点	1998.1	2009.5	2016.9	2020.2	1998.6	2009.5	2016.9	2020.2	2020.2
时间跨度(月)	19	21	39	10	19	21	39	10	10
标准差	6.77	117.72	75.51	27.60	4.74	38.59	36.90	109.23	160.72
平均	151.82	1076.70	1869.15	2053.16	149.52	1077.98	1881.84	2020.88	1990.12
最小规模	142.16	924.24	1764.71	2016.32	110.00	648.95	1200.79	1119.46	608.63
最大规模	162.55	1261.25	2027.84	2088.17	200.01	1364.32	2317.96	2382.68	2382.68
振幅	20.39	337.01	263.13	71.85	90.01	715.37	1117.17	1263.21	1774.04
相对振幅	13.43%	31.30%	14.08%	3.50%	60.20%	66.36%	59.37%	62.51%	89.14%
波动强度	0.71%	1.49%	0.36%	0.35%	3.17%	3.16%	1.52%	6.25%	8.91%
波谷期与周期比	15.00%	24.00%	95.00%		15.00%	24.00%	95.00%		
变异系数	4.46%	10.93%	4.04%	1.34%	3.17%	3.58%	1.96%	5.40%	8.08%

表2 各周期比较

单位：亿美元

项目	周期	一	二	三	四
使用数据	起止时间	1998.10—2009.5	2009.6—2016.9	2016.10—2020.2	2020.3—
趋势数据	周期(月)	128	88	41	13
	平均	541.36	1 668.92	2 002.71	2 332.13
	最高	1 256.96	2 030.93	2 111.68	2 665.32
	最低	142.16	932.52	1 766.17	2 022.45
	标准差	349.58	278.31	108.01	228.10
	振幅	1 114.81	1 098.41	345.51	642.87
	相对振幅(%)	2.06	0.66	0.17	0.28
振幅强度(%)	0.02	0.01	0.00	0.02	
原始数据 (统计局 数据)	平均	540.92	1 669.96	1 995.43	2 319.73
	最高	1 366.75	2 275.13	2 382.68	2 819.28
	最低	110.00	945.23	761.97	1 851.46
	标准差	355.49	327.14	274.08	287.87
	振幅	1 256.75	1 329.90	1 263.21	967.82
	相对振幅(%)	2.32	0.80	0.63	0.42
	振幅强度(%)	0.02	0.01	0.02	0.03
原始数据 (海关数据)	平均	540.92	1 669.96	1 987.92	2 319.73
	最高	1 366.75	2 275.13	2 382.68	2 819.28
	最低	110.00	945.23	608.63	1 851.46
	标准差	355.49	327.14	325.86	287.87
	振幅	1 256.75	1 329.90	1 774.04	967.82
	相对振幅(%)	2.32	0.80	0.89	0.42
振幅强度(%)	0.02	0.01	0.02	0.03	

### 三、实证分析

#### (一) 研究假说与模型构建

研究表明,影响出口的因素越来越不限于经济领域,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空间距

离、运输便利条件、人口规模与结构以及军事、社会、文化等等因素都会对出口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 (Deardorff, 1995<sup>[35]</sup>; Frankel and Romer, 1999<sup>[36]</sup>)。同时也发现,在全球化发展到当前的水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口交往所面临的常规性壁垒已经或正在被扫除,最终沉淀下来的诸多因素已集中到若干重要方面。当这些影响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以突变的方式改变出口的运行状态。那么,如果以承载了这些重要变化信息的重大事件为切入点考察出口运行的周期变动特征,不失为一条有益的探索途径。本文基于20多年以来综合了多种因素的重大国际事件和可被视作重大事件的国内经济运行的转型的维度,提出四个方面的研究假说,以考察出口的中期和中短期运行特征。

假说一:我国出口的运行已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

尽管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关键词之一,但是我国出口的运行不可能脱离已成功践行40多年来形成的主路径,即使遇到诸如新冠疫情这类突发状况导致大幅波动,就长期看偏离主路径的可能性很小。

假说二:国际重大事件成为主导我国出口运行的中周期更迭的重要变量。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历来是两种相互博弈的力量,尽管前者已成主流,后者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反推力量。正是在此过程中,我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潮,特别是2001年末的“入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使我国的出口运行与世界经济的运行逐渐同步(杨子暉和田磊,2013<sup>[37]</sup>;马丹和何雅兴,2019<sup>[38]</sup>)。同时,中国出口的贡献令世界的出口格局发生改变,自身也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1999—2019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速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达到72.31%。可以初步判断,重大事件与我国的出口运行状况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假说三: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对我国出口的运行周期运行有重要影响。

20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头20年间,美国先后有4位总统执政,他们在其任期内既有过改善双方经贸关系的举措,也对我国采取过不同程度的贸易打压或制裁措施。其中,在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内,中美经贸关系相对缓和并有所改善,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总体上是“冷热相伴”,而在特朗普执政期后期,中美经贸关系又趋于紧张。鉴于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出口的重要性,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冷热”程度可能影响到我国出口运行的中周期变动。鉴于中美经贸关系对于我国出口的重要性,也可将这种关系的重大变动视为重大事件。

假说四:国内经济运行状况的重大变动对出口运行的中周期变动有重要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GDP至少以7%以上的增速运行了25年之久,其中有11年是在10%以上,特别是在2003年到2008年间,连续6年在10%以上。但是自2015年之后降到7%以下。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资本市场正是在这一年大幅下滑。诸多重要信号均揭示国内的经济运行开始进入了新阶段,相应对出口的中周期运行状况也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上述四条假说,本文拟通过构建如下模型(1)予以检验。

$$EXP_t = \alpha_0 + \alpha_1 \cdot TREND_t + \alpha_2 \cdot LAGEXP_t + \sum_{j=1}^3 \beta_j \cdot EVENT_{jt} + \sum_{i=1}^3 \varphi_i \cdot REAL_{it} + \theta \cdot XCT_t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EXP* 代表出口趋势。 $\alpha_0$  代表常数项，长期趋势项用 *TREND* 表示，用以检验假说一。*LAGEXP* 代表出口的短期滞后项，由于出口的短期运行中只有春节效应明显，故选择将滞后 12 期的出口变量引入模型。对于最关键的影响出口的中周期变动的重大事件变量，一并纳入变量 *EVENT* 之中，其中包含三次国际重大事件，分别用 *ASIA*、*WORLD*、*COVID* 代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 2019 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均以哑变量的方式引入，验证假说二。用变量 *REAL* 来代表中美经贸关系，具体估计中是分别将克林顿（Clinton）、小布什（Bush）、奥巴马（Obama）和特朗普（Trump）四位美国总统的执政期作为代理哑变量，按照时间顺序将克林顿的执政期作为基础变量，以验证假说之三。由于最新的样本数据截至 2021 年 3 月，距离拜登政府执政仅仅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其对华经贸关系并不会在短期内与特朗普政府有重大差异，所以是否单独再引入变量不会对参数估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为简化处理就不作为单独变量引入模型。哑变量 *XCT* 表“新常态”，表示自 2015 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的重大转变。尽管该次转型不是以突发的方式出现，但就其对出口运行的中期更迭效果而言，并不亚于一次重大事件。 $\varepsilon$  代表随机扰动项，假设服从 *iid* 分布。

(二) 实证结果

估计模型的参数之前，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作常规性的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表 3）显示，尽管各中周期的出口趋势数据并不平稳，但是全样本数据表现平稳。

表 3 平稳性检验

周期 时间	一 1998.10—2009.5		二 2009.6—2016.9		三 2016.10—2020.2		全样本 1997.6—2021.3	
水平 数据	常数项，趋势项，滞后 期 6（SIC 准则，最大滞 后 12）		常数项，趋势项，滞 后期 3（SIC 准则，最 大滞后 12）		常数项，趋势项，滞 后期 3（SIC 准则，最 大滞后 12）		常数项，趋势项， 滞后期 3（SIC 准 则，最大滞后 12）	
临界值	6%	-4.0313	-4.0657	-4.1985	-3.9909			
	5%	-3.4453	-3.4617	-3.5236	-3.4258			
	10%	-3.1475	-3.1571	-3.1929	-3.1361			
t 值	-1.8298		-1.5631	-1.7319	-3.5080			
结论	非平稳		非平稳	非平稳	平稳			
一阶数据	常数项，趋势项，滞后 期 5（SIC 准则，最大滞 后 12）		常数项，趋势项，滞 后期 2，（SIC 准则， 最大滞后 12）		常数项，趋势项，滞 后期 2（SIC 准则， 最大滞后 12）		—	
临界值	1%	-4.0313	-4.0657	-4.1985	—			
	5%	-3.4453	-3.4617	-3.5236	—			
	10%	-3.1475	-3.1571	-3.1929	—			
t 值	-6.3404		-4.2080	-3.7117	—			
结论	一阶平稳		一阶平稳	一阶平稳	—			



由于使用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参数时存在显著的异方差和自相关等问题,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稳健回归 (ROBUST) 方法, 同时也将按照广义线性回归 (GLM) 方法和 OLS 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作为比照, 一并列于表 4。

上表的实证结果首先验证了假说一, 即我国出口存在显著的长期增长效应; 其次, 验证了近 20 年以来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具有更迭出口运行中周期的假说之二。实际上, 上述的每次重大事件, 也是在释放经济运行周期发生更迭的信号。第三, 验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周期变动, 即假说之三。第四, 验证了国内经济运行的重大转型同样对出口周期的更迭有显著影响。此外, 也验证了出口以“春节效应”表现出的短期波动特点。下文分别作具体分析。

表 4 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变量	ROBUST	GLM	OSL
常数项	-135.0783 <sup>***</sup> (20.0288)	-162.5335 <sup>***</sup> (24.8032)	-177.2546 (156.7271)
@TREND	8.1933 <sup>***</sup> (0.5188)	9.3361 <sup>***</sup> (0.6425)	12.3259 <sup>***</sup> (0.8678)
LAGEXP	0.3311 <sup>***</sup> (0.0442)	0.2524 <sup>***</sup> (0.0548)	-0.3761 <sup>***</sup> (0.0537)
ASIA	80.8330 <sup>***</sup> (25.7997)	99.7950 <sup>***</sup> (31.9497)	0.0268 (6.5424)
WORLD	-234.3145 <sup>***</sup> (16.5409)	-174.5129 <sup>***</sup> (20.4838)	0.7130 <sup>*</sup> (0.4030)
XCT	-374.1591 <sup>***</sup> (18.9418)	-347.9393 <sup>***</sup> (23.4571)	-0.8603 (0.7960)
COVID	-142.2337 <sup>***</sup> (23.0746)	17.2125 (28.5750)	0.1779 (0.4108)
BUSH	-149.5106 <sup>***</sup> (24.3007)	-179.8948 <sup>***</sup> (30.0934)	-0.2182 (1.8912)
OBAMA	-154.5290 <sup>***</sup> (36.3943)	-222.7790 <sup>***</sup> (45.0698)	0.5491 (2.1358)
TRUMP	-168.0191 <sup>***</sup> (50.2249)	-318.0436 <sup>***</sup> (62.1973)	0.4799 (2.1977)
AR (1)			3.3757 <sup>***</sup> (0.0390)
AR (2)			-4.4979 <sup>***</sup> (0.1105)
AR (3)			2.8313 <sup>***</sup> (0.1116)
AR (4)			-0.7111 <sup>***</sup> (0.0402)
Akaike info criterion	349.6914	11.7605	4.5630
Schwarz criterion	389.3085	11.8924	4.7608
Log likelihood		-1601.1930	-610.1331
Hannan-Quinn criter.		11.8135	4.6424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其中\*\*\*、\*\*、\*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首先,就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看,既是我国实行开放政策40多年以来的成果、也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环境相对平稳的体现。尽管在此期间出口会不定期、不同程度地经受前述重大事件的冲击,但长期上升的主路径已经形成。国内则随着市场化改革举措的波段式推进,总体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增长。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全球经济大幅下滑的2020年,我国仍以2.3%的增长率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正是这一点,根本上保证了我国出口能够从危机中快速恢复、稳定了我国在国际出口市场的基本格局。实际上,自1998年至今,我国对北美和欧洲市场的出口份额合计基本上稳定在20%上下,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则从1998年的54.24%降到了2019年的48.84%,在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市场份额,从5.18%上升到12.94%,揭示我国出口洲际市场结构的新动向。我国出口能够稳定运行的另一个重要保障是,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历经多次考验后逐渐提升,所以,无论是国内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地位以及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都保证了我国出口能够长期相对稳定地增长。

其次,关于我国出口中周期的更迭,触发因素是相隔10年左右爆发一次的重大事件和国内经济的重要转型。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是,亚洲金融危机事件没有产生阻碍出口的效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此次危机相对于中国当时具备的要素成本优势并未构成实质性影响,反而相对强化了中国的出口优势。因为恰是在这段期间,其他重要的东南亚出口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他们为继续保持其快速增长的局面,采取了包括过度开放资本市场的系列激进政策,以致无法应对国际巨额游资的冲击。危机真正发生时已经没有了有效的化解措施,导致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另一个促使我国出口快速恢复并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是,距离此轮危机不到10个月我国实现了“入世”,可以说成功“入世”在本轮周期中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出口的不确定性。随后的两次世界性危机,无论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程度还是波及范围,都远超亚洲金融危机,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彻底结束了我国出口持续增长的上一轮中周期,使出口增速、波动幅度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而2019年的第三次重大事件即新冠疫情对于出口的冲击同样严重,又一次打破了出口新一轮的中周期运行轨迹而进入新的周期阶段,特别是在出口波动强度方面对出口的冲击尤为显著。

为何这些重大事件会影响出口的中周期更迭,主要源于宏观经济自身周期运行的波动。研究表明,世界经济的周期运行规律依然存在(Backus et al., 1992<sup>[39]</sup>; 宋玉华和徐前春, 2004<sup>[40]</sup>)。无论是凯恩斯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假设下推演的经济周期理论,还是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相结合以解释周期波动的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或者是希柯斯同样以上述分析工具对投资扩张与收缩的阐释,并在区分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后,将引致投资作为决定周期运行的关键变量,相应提出了为期7-10年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从货币和信贷扩张与收缩角度分析的经济周期运行,都是在阐释总供给和总需求如何从非均衡向均衡作持续调整,从而形成围绕均衡状态波动的周期运行规律。究其实质是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经济行为主体

之间对于信息的接受总是存在空间或时间上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包括价格信号在内的诸多信号会向市场提供资源稀缺程度的信息,决定着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的主方向,另一方面各经济主体在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方面同样存在着巨大差异,并且对经济预期也有很大不同,故而市场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非均衡才是运行常态,均衡状态反而是特例。一般的情况是,市场供给扩张会逐渐带动需求的提升,并刺激预期的高涨推升信用扩张和投资增加。在“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下,总产出自然不断增加。然而,在消费边际倾向递减和资本边际产出下降的作用律下,总需求往往又会走向自我抑制的方向,除非有新市场出现,否则必然导致供给过剩,直到运行到“阈值”后重新向均衡状况作逆向调整,即从繁荣转向衰退。该反向调整一旦开启同样遵循“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且不会在调整到恰好均衡状态时自动停止,而是会继续下调至供不应求的“阈值”点,即萧条阶段,直到市场消化掉过剩的产能,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便再度重启。在此过程中,尽管政府能够期望通过逆周期调整以消化过剩产能,但也只是降低衰退程度、或延缓时间,甚至还可能因判断失误或者是其他意外导致干预过度以致加剧波动,造成新一轮的“滞胀”或衰退。因此,真正能够削弱周期剧烈波动的内在力量仍来自市场自身的运行机制。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正是从这方面对经济周期做出了阐释。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供给冲击引起的,创新活动不但会抑制经济衰退、还会推动经济不断上升到更高的均衡水平。但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又决定其只能以离散而不是连续状态出现,从而形成新的经济运行周期。长期看“创造性毁灭”是推动经济持续繁荣的决定力量。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长经济周期正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有力注释。可以注意到世界经济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以来先后经历的蒸汽时代(1782—1845)、铁路时代(1845—1892)、电气时代(1892—1948)和自动化时代(1948—1990),都极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目前,我们正在进入已经开启30年的信息时代。在每一个伴随重大技术创新而展开的经济长周期运行过程中,与新技术相关的局部技术创新同样是以离散方式不断修补和完善,同时伴随着设备的更新与投资扩张作周期性的波动。因此,经济运行除了有长周期运行特征之外,还会形成为期10年左右的中周期,称之为希克斯周期或者尤格拉周期。通过对1961—2019年间横跨“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的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非对称滤波周期分解发现,中周期长度在7—11年之间,与希克斯周期和尤格拉周期大致相符。<sup>①</sup>具体来看,20世纪末的周期大致在11年左右,21世纪初的头一个中周期缩短到8年上下,第二个中周期大致在7年左右。显然,周期长度呈现逐渐缩短的趋势。

同时我们也发现,自动化时代尾期的1961年至1990年约30年间,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是4.11%。信息时代初期的头30年间,平均增速仅2.83%。毋庸置疑,20世纪末全球的科技水平远比之前更高,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水平被认为会同历史上其他重大技术进步一样促进经济的再次增长。然而“索洛悖论”揭示该预期至少在信息化时代的头30年并未成为现实。特里普利特(Triplett,

<sup>①</sup>因篇幅所限,周期分解的结果未放于文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

1999<sup>[41]</sup>) 对此给出了多方面解释, 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技术扩散存在滞后效应, 二是对于信息技术的管理失误导致成本反而增加。而 21 世纪初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也为其提供了新注解。此外“数字鸿沟”日益明显, 信息技术的进展和应用不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巨大差距, 即使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部, 也存在行业和地区差异。市场主体面对 21 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科技, 或是出于谨慎性考虑, 或是出自管理运行成本方面的考虑, 以及对其他不确定因素的评估, 必然对新技术的投资决定存在一个甄别和过渡期, 在新旧技术交叉的过渡期尤为突出。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在信息时代的初期仍在部分延续着电气时代末期的水平, 信息技术仍处于向不同产业和领域缓慢渗透的阶段, 因此资本的更新周期也更为复杂。最近的 30 年间又恰好处于这一阶段, 这是导致世界经济中周期运行变动复杂、进而影响我国出口周期运行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 重大事件无非是经济周期变更的重要外在表现。

由此回溯亚洲金融危机, 表面上是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层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实际上是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在危机发生之前已经严重失衡, 一方面旧技术的投资边际回报率日趋下滑, 另一方面包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尚处于初期。他们试图通过激进的扩张信用和盲目开放市场来实现更高增长率的目标, 结果反而将其内在的金融风险和经济结构失衡充分暴露出来, 以致任何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冲击都有可能成为触发其进入衰退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来自国际上的庞大“游资”扮演了这一角色。

与之相反的情况是,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我国已经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 即使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依然凭借要素成本的价格优势很快恢复了出口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一次危机不但没有对我国的出口构成压力, 而是恰恰相反。时隔 8 年之后, 尽管信息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距离全面推动经济增长尚存巨大差距。即使美国作为新经济的领头羊, 造成“索洛悖论”的上述关键因素依然存在, 在资本更新的“空窗期”恰逢基础工业部门进入约 20 年左右一次的波动周期, 特别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诸多因素叠加使房地产领域再次成为资本的“周转池”, 并通过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将泡沫不断吹大直至破裂, 最终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资本的调整。此次危机使全球经济受到重大冲击, 与世界经济深度接轨的我国同样未能幸免, 出口自然深受冲击。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一方面,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在继续发展, 市场应用领域不断拓宽和深化, 使世界经济的运行开始逐渐突破“索洛悖论”, 世界范围的资本更新频率也在缓慢提升。正如周期分解结果所揭示, 经济运行的中周期长度在缩短, 波动幅度有所下降。但与上两次重大事件导致的出口中周期更迭情况不同的是爆发了新冠疫情。换言之, 即使没有出现新冠疫情, 出口也会发生周期性波动, 疫情放大了此轮波动的幅度和强度。

第三, 实证结果所揭示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效应显示, 无论是在小布什、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执政期间, 均比克林顿执政期间的出口有所下降。其中, 小布什执政期间我国出口受到的阻碍最小, 与特朗普执政后期的情况正好相反。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上, 是以更加强硬的方式贯彻“美国



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技术垄断政策。同时美国又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国。1998年到2007年间,我国对美出口份额基本稳定在21%上下,这段时间正是小布什总统执政的大部分时期。自小布什执政初期发生“9.11”事件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开始趋缓,21世纪的头7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快速上升。但是自2007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开始下降,从当年的19.11%降到2013年的16.68%,2015年才恢复到18%。这段时间主要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特别是从2010年之后两国经贸关系趋紧,我国出口的整体运行状况也陷入波动,同比增速不断下降。而特朗普总统执政的头3年,我国向美国的出口比重又持续上升,截止2018年恢复到接近2007年的水平,同期我国总体出口的同比增速也较奥巴马执政后期有所提升。然而进入特朗普执政的倒数第2年即2019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降到接近2013年的水平,下降2.49个百分点,年度出口额比2018年下降597亿美元,两项数据都是2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同期我国总体出口的同比增速也大幅下滑。

第四,从国内经济的运行情况看,因市场化改革逼近深水区导致推进难度升级,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基本走到尽头。以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库存过多为表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到2015年开始集中爆发,当年的经济增速也创下新低,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资本市场再次受挫,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此后4年内经济增速基本上维持在6.7%上下的水平,出口相应受到很大程度的拖累。

综上,我们可以把包含286个月度的出口运行数据划分为4个中周期。

#### 四、进一步的讨论

##### (一) 出口中短期运行状况的比较

通过运用非对称时间滤波方法可以得到三个出口中周期的中短期运行特征,具体结果如图3所示。显然,在第一个中周期内表现出5年的中短周期运行特征,在第二个中周期大致显现出为期3年的中短周期运行特征,在第三个中周期显示出周期为2年的中短周期运行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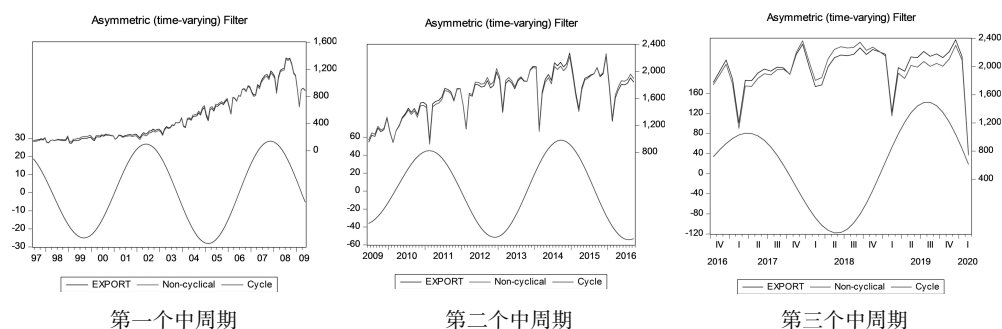


图3 三个中周期的中短期分解

如同周期长度逐期递减的三个中周期一样,每一个中周期内部的中短期也在逐期缩短,表明各个中周期出口运行的稳健程度在降低。出口运行能够在第一个中



周期相对稳健运行，核心因素之一是我国颇具竞争力的要素成本优势，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高“性价比”优势（廖涵和谢靖，2018<sup>[41]</sup>）。考虑到当时我国还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更佐证了我国的低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在当时的国际竞争力。

出口在第二个中周期的运行远比第一个中周期更为复杂，一是遭受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萎靡，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二是国内短期内密集出台的系列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不但未能将高耗能、非技术密集型的产能升级改进，反而支持了大量缺乏竞争力的领域和企业，特别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短期的应急之举反而阻碍了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的长期战略目标，既未能给国内循环的顺畅运行给予前瞻性支持，也未能对国际循环提供前瞻性的助力。相反，那些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始终坚持对基础研究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大量和持续投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方面。尽管这些国家的一般性商品的出口总规模不及我国，但是他们对各方面专业人才、创新行为和创新成果的重视和保护，均是保证他们具有持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姜超，2017<sup>[42]</sup>）。换言之，这些国家是从战略层面保持了与我国出口产品在结构方面的前瞻性优势。能否将我国出口结构方面的“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是我国出口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密集的短期应急之举对于出口运行的影响在随后的五、六年之后开始显现。可以注意到出口的第三个波谷显著异于以往的两个波谷，该波谷期的时间跨度相当于其他两个波谷期长度之和，同时还首次出现连续两年下滑的情况。而在这段时间内实际上并未发生诸如前两次那样的重大危机事件，相反2015年世界经济的增速反而有所提升，达到2.88%，当年我国的出口却下降3.14%。2016年世界经济虽有所下降，也达到了2.59%，我国出口则下降6.03%。显然，造成此轮出口波动的主要原因来自国内经济的波动而不是来自外部。正是在2015到2017年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异常波动，主要原因是政府为缓解上次危机采取的一系列密集短期刺激政策的负面效果开始集中显现，通货膨胀压力、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等结构性问题凸显并放大。在政府试图着力纠正上述问题拟将资金引向有利于创新的高科技领域和产业时，却由于政策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监管失位，反而导致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形成与预期政策目标相悖的巨大金融风险。政府在紧急采取“一刀切”式的紧缩性调控政策之后，虽然资本市场投机过度得到控制，但是总体经济也开始严重下滑，出口运行也相应受到了较长时间的抑制。

## （二）平均环比增速的差异

更长的出口运行周期也意味着出口能够相对稳定地运行。在长达132个月的第一个中周期，共有113个月实现了正增长，占85.61%。在此期间，还分别出现过连续23个月（1999年7月~2001年5月）和连续80个月（2002年3月~2008年10月）同比正增长的情况。第一个中周期的月均同比增速高达21.02%，平均月环比增速也达2.25%。第二个中周期的长度较第一个中周期缩短56个月。总共88个月之中只有57个月实现了环比正增长，占整个周期的64.77%，而且是正、负增长的情况交替出现。无论是8.58%的平均月同比增速，还是1.94%的平均月环比增

速，均显著低于第一个中周期。第三个中周期的周期长度又比上一周期缩短47个月，正负增长的分布基本与第二个中周期相似。平均月同比增速只有3.55%，平均月环比增速只有0.13%，又低于第二个中周期。第四个中周期尚处于开始阶段，下文一并做出分析和预判。

### （三）对第四个中周期运行的预判

该轮中周期的开启同样源自重大事件的冲击，而且是百年一遇的疫情。疫情危机与世界经济运行周期叠加，导致此轮出口周期内波谷的振幅、振动强度、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均与以往不同。按照统计局出口趋势数据计算，在波谷下降期，连续7个月累计降幅只有3.53%，波谷低点出现在2020年2月。但按照原始出口数据计算，累计降幅高达50.63%。2020年2月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7.2%，环比增速下降47.61%，均创23年以来的新低。同时也使3月份的出口环比增速高达65.39%，同样创历年之最。如果按海关数据计算波动程度更大，2月份的同比增速下降54.98%，环比增速下降73.72%，3月份出口环比增长则高达到204.2%。以致2021年2月份的同比增速按照统计局数据是82.99%，按照海关数据则高达236.58%。还有就是为期10个月的波谷期在四个波谷期中最短，意味我国的出口很快就从第四个周期的波谷中恢复。以趋势值计算出口规模在2020年5月份已恢复到2019年8月份的水平。

那么，出口将在第四个中周期的恢复期开始之后如何运行，基于前文的分析可以做出如下四点判断。

第一，出口运行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仍将继续发挥作用，持续上升的趋势不大可能发生逆转。除非新冠病毒及其传染能力更大的变异病毒再次爆发。但是，在世界各国政府、科学家、相关组织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以及人类历史上多次与各种重大疫情博弈的经历来看，可能性不大。相反，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球经济也将逐渐复苏，出口也将重返相对稳定运行的主轨道。实际上，在周期开启阶段出口的运行情况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如实际出口值甚至在2020年12月份以2819亿美元创下了近20年以来的新高。除了有短周期的运行规律发挥固有的作用之外，还有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导致印度、东南亚等国将部分外贸订单转向中国。即使进入2021年2月份的低谷期，出口规模仍高达2048亿美元。

第二，出口的波动幅度可能会加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的约束下，全球经济的恢复不可能顺利推进。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3.6%，欧元区各国经济整体缩减7.4%，日本降低5.3%。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全球还是我国的出口规模自然不会很快恢复。但是我们发现，截至2021年3月份新一轮周期启动13个月以来，无论是我国的出口规模还是出口增速都在以超常的速度运行。按照趋势值计算，相当于每月平均增加46.66亿美元，远高于其他三个中周期头13个月的恢复速度，更是历年平均增加量的6倍多。按趋势数据计算，月均同比增速13%的水平同样高于其他三个中周期的头13个月。按照实际值计算，头13个月的同比增速也高出历年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显然在当前全球经济没有全面恢复的形势之下这种快速增长并不可持续。换言之，考虑到疫情可能出现局部的反复和其他不确定性事件，在出口过于快速的上升之后可能迎来新一轮的快速下

降过程，导致出口的波动幅度加大。

第三，该轮中周期的长度至少不会比上一个周期持续的时间更长。随着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不断突破，“索洛悖论”存在的两个主要条件在不断弱化，资本投资更新的周期可能继续缩短。此次新冠疫情一方面放大了该轮震荡所导致的“创新性毁灭”力度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加速推动更多更具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企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该次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倒逼国内企业加速改善出口结构的效果。

第四，出口增速将维持在更低的水平。第一个中周期，得益于优越的要素成本优势，出口得以在132个月中取得平均环比增速20.35%的成绩。进入第二个中周期之后，随着国际竞争压力的增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平均环比增速不及上一周期的一半，第三个周期阶段的平均环比增速又不及上一周期的一半。第四个周期的头13个月，平均环比增速回升至7.56%。2021年之后，除非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否则短期之内世界经济仍难全面恢复，世界整体的出口规模必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同时考虑到尽管2021年伊始特朗普政府被拜登政府取而代之，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强硬经贸政策会被推翻，因此第四个中周期的出口增速很可能不会高于上一个中周期。

####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综合分析，我国出口既呈现出长周期的运行特征，更表现出了中周期的变化特点。

首先，显著的趋势效应揭示我国出口正处于长周期中的上升阶段。内因是国内经济具备保持出口相对稳定增长的“硬核”条件，即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和14亿人口的市场、超过1.7亿受过高等教育且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本，以及初具架构并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因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地位。相应的政策含义是，我们必须在巩固前期市场化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把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加快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对外继续秉持开放的长期政策。

其次，从出口的中周期运行看，已经历了三个非对称的中周期，目前进入第四个中周期。其中，每隔10年左右发生一次的重大事件对我国出口的中周期更迭有重要作用，同时国内经济运行的重大转型同样对出口中周期的变动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原因在于，经济周期运行的内在规律，以及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与世界经济运行的同步性增强。而重大事件和国内经济的转型是经济周期变更的信号或者是“触发器”。相应的政策含义是，为削弱经济运行周期变动给出口带来的不利冲击，应及时将扩张出口规模和提升出口增速的目标转向改善出口结构和促进出口的相对平稳运行方面。具体来看，一是持续加大向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快资本更新节奏；二是完善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包括从深层次排除阻碍创新的制度性障碍，完善科研创新的评价机制、促进自由学术氛围建设、以及健全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从根本上提升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同时还要使政策之间的配套程度更高，最大程度上缓解下一次重大事件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力度。

最后, 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特殊地位和在中国出口市场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冷热”必然直接关系到我国出口的运行状况。相应的政策含义是, 我们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当中, 宜采取更加灵活、积极和务实的对话方式, 降低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

### [参考文献]

- [1] 谢建国, 章素珍. 反倾销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以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为例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1): 153-164.
- [2] 张先锋, 陈永安, 吴飞飞.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能否缓解中国对外贸易摩擦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7): 43-61.
- [3] 杨飞, 孙文远, 程瑶. 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10): 99-117.
- [4] 余振, 周冰惠, 谢旭斌, 王梓楠. 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7): 24-42.
- [5] 江小涓.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 [J]. 经济研究, 2007 (5): 4-16.
- [6] 杨汝岱, 朱诗娥.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研究: 1978—2006 [J]. 财贸经济, 2008 (2): 112-119+128.
- [7] 裴长洪. 中国对外贸易 60 年演进轨迹与前瞻 [J]. 改革, 2009 (7): 5-12.
- [8] 张桂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历史演进 [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08 (2): 82-86+90.
- [9] 刘建丽. 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竞争力变动与贸易政策分析 [J]. 经济体制改革, 2009 (1): 12-16.
- [10] 傅朝阳, 陈煜. 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 1980—2000 [J]. 经济学 (季刊), 2006 (1): 579-590.
- [11] 林毅夫, 李永军.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J]. 管理世界, 2003 (7): 21-28+66-155.
- [12] 孙杰. 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 [J]. 经济研究, 1997 (12): 62-69.
- [13] 潘镇. 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7): 45-52.
- [14] 刘国晖, 张如庆. 论困境倒逼下的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J]. 经济学家, 2014 (2): 59-66.
- [15] 郑有国, 刘佑军. 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机理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7 (7): 10-15.
- [16] 魏锋, 沈坤荣.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基于 1978—2007 年的经验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10): 9-17.
- [17] 吴福象, 刘志彪. 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的微观经济分析: 1978—2007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1): 70-83+205-206.
- [18] 诸竹君, 黄先海. 中国出口跨越了“低加成率陷阱”吗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5): 14-27.
- [19] 陈志友. 产业结构演变中的对外贸易战略的阶段性 [J]. 财贸研究, 1992 (3): 47-52.
- [20] 莫兰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变迁探析 [J]. 上海经济研究, 2016 (3): 44-51.
- [21] 许昌平. 中国企业进出口市场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3, 35 (5): 106-114+128.
- [22] 陈勇兵, 李燕, 周世民. 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 [J]. 经济研究, 2012, 47 (7): 48-61.
- [23] 鲁晓东, 刘京军. 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 [J]. 经济研究, 2017, 52 (9): 39-54.
- [24] 唐宜红, 林发勤. 外部需求冲击与中国的出口波动——基于随机动态局部均衡模型的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 (1): 39-43+88.
- [25] 陈刚, 尹希果, 黄凌云. 进口贸易、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 [J]. 经济评论, 2008, (3): 34-40.
- [26] BAXTER, M. Business cycle and the asset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5, 36 (4): 821-853.
- [27] 李旸, 李天德, 陈少炜. 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 [J]. 经济学家, 2013 (10): 94-102.
- [28] 郑宝银, 林发勤. 世界经济周期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1): 3-9.
- [29] 车维汉, 贾利军. 国际贸易冲击效应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1978—2005 [J]. 世界经济, 2008, (4): 25-36.
- [30] BOIVIN, J. AND GIANNONI, M. P. *Global forces and 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n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1] 杜婷. 国际贸易冲击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6, (12): 12-17.
- [32] 宋玉华, 高莉. 世界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机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 (3): 19-25+87.
- [33] 郎丽华, 张连城. 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研究 [J]. 经济动态, 2011 (11): 24-30.



- [34] 赵琳, 张珣, 徐山鹰. 基于广义动态因子模型的中国出口周期分析与预测 [J]. 系统科学与数学, 2011, 31 (3): 312-325.
- [35] DEARDORFF, V. ALAR.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Does Gravity Work in a Neoclassic 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77, 1995.
- [36] FRANKEL, JEFFREY A, ROMER, DAVID. "Does Trade Cause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7, pp. 379-399.
- [37] 杨子晖, 田磊.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研究 [J]. 世界经济, 2013, 36 (1): 81-102.
- [38] 马丹, 何雅兴. 危机传递、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 [J]. 统计研究, 2019, 36 (7): 77-90.
- [39] BACKUS, DAVID K, KEHOE, PATRICK J.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 (4), pp. 864-888.
- [40] 宋玉华, 徐前春. 世界经济周期理论的文献述评 [J]. 世界经济, 2004 (6): 66-76.
- [41] JACK E. Triplett. "Economic Statistics,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 Business Economics, 1999, 34 (2), pp. 13-17.
- [42] 廖涵, 谢靖. "性价比"与出口增长: 中国出口奇迹的新解读 [J]. 世界经济, 2018, 41 (2): 95-120.
- [43] 姜超, 中国出口规模世界第一, 但附加值占比都不算高. [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7-07-12/doc-ifyhweua4866771.shtml>

(责任编辑 蒋荣兵)

## An Analysis of the Cycle and Trend of China's Export —Based on A View of Crucial Events

LIU Jiang LI Yifu

**Abstract:** China's export has experienced an upward fluctuation proces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which has been inflated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ve some internal regular factors been hidden behind the seemingly complicated fluctuation? This paper, from perspectives of crucial events as well as domestic macro-economic transition, and based on the monthly export data between 1997 and 2021, finds that China's export has experienced three asymmetric periodic processes and has just entered in the fourth cycl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ast three cycles successively show a trend with length shorter, growth rate slower, fluctuation range wider, furthermore, it also predicts relevant figures and features of the ongoing fourth cycle. The policy meaning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in China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faster and more deeply, and the export goal of the scale-aimed and speed-aimed should be turn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export's structure and stable growth rat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xport cycle. For that,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which have blocked the innovation process should be removed, and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ith related nations should be perfected.

**Keywords:** Export Cycle; Juglar Cycle; Export Valley; Fluctuation Range; Fluctuation Intensity